

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堵点：省界、文化与地理

魏东霞¹, 陆铭²

(1. 广东金融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21; 2. 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30)

摘要: 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 劳动力畅通流动最为重要, 但是对劳动力流动的堵点缺乏跨时期的评估, 以致形成了劳动力跨省流动趋弱的认识。基于2000—2015年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 省界分割会显著降低城市间的人口迁移规模, 方言、自然地理和距离也是人口流动的阻碍因素, 且省界分割效应有增强的趋势, 这是省际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滞后于省内一体化所致。例如, 人口流出地省份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可以显著降低个体跨省流动的概率, 而人口流入城市的高落户门槛则会强化省界分割的效应。流入地第三产业的发展会减弱省界壁垒的效应, 却会强化方言对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省界、方言和地理距离这些劳动力流动的障碍, 会扩大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 要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 必须凝聚共识, 进一步疏通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堵点。

关键词: 统一劳动力市场; 省界; 劳动力流动; 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0892 (2026) 07-0003-15

一、引言

在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的今天, 劳动力畅通流动尤为重要。2022年4月10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 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作出了顶层设计。《意见》提出, 要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 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 促进劳动力跨地区顺畅流动。面向未来, 为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 只有通过克服传统体制与观念的束缚, 畅通生产要素市场的内循环, 才能释放改革的红利,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陆铭, 2022)。与统一大市场的目标相比, 中国始终存在着地区间的市场分割问题, 省界的边界效应是市场分割的主要体现(Poncet, 2003; Zheng等, 2022)。目前看, 国内市场的互联互通促进了省际贸易强度的提高, 但要素资源互联互通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吴楚豪等, 2025)。

在劳动力要素流动方面, 省界的作用是怎样的, 又是如何变化的? 数据显示, 我国劳动力跨省流

收稿日期: 2026-02-14 修返日期: 2026-06-0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超大规模市场的动态均衡理论与量化方法研究: 结构转型与改革路径”(7234203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户籍分割视角下中国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研究”(20BJY050)

作者简介: 魏东霞, 广东金融学院教授, 经济学博士, 主要从事流动人口与城市经济研究; 陆铭(通信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经济学博士, 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 联系方式 luming1973@sjtu.edu.cn。

动人口的比例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呈现下降的趋势。图1虚线显示,在不分迁移原因的所有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比例分别是35.04%、38.85%和33.22%。图1实线则根据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2015年1%的人口抽样调查的样本数据汇总计算因工作原因流动的人口,其中,跨省流动比例分别是76.19%、79.11%、75.48%和52.46%。尽管二者口径略有不同,但均显示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比例呈下降趋势。而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则显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比例已经从2008年的53%下降到2022年的41%^①。这与王桂新(2022)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的省际人口迁移的强度在弱化、规模在减少的结论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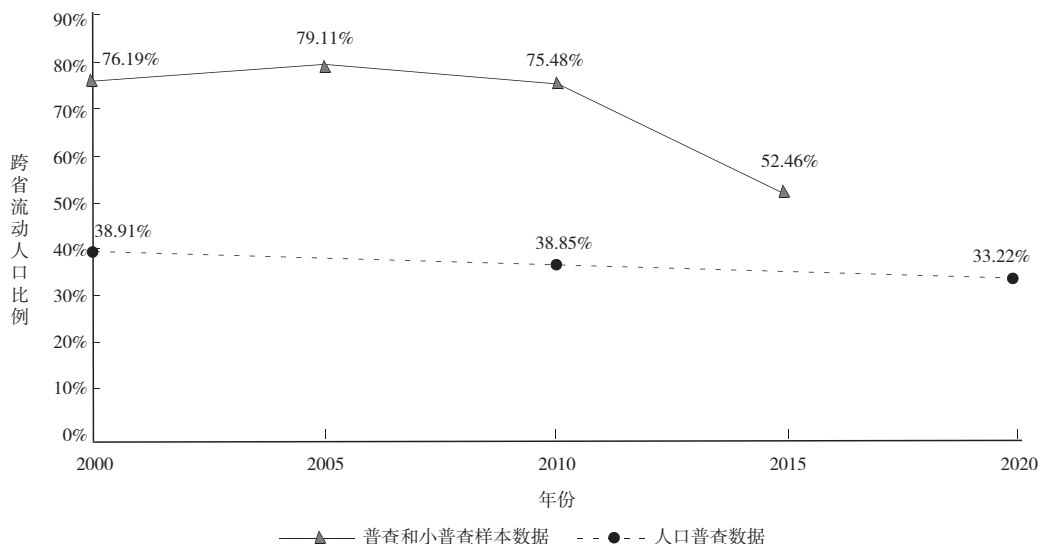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20年跨省流动人口比例

注:虚线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五、六和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公布的迁移人口数据计算,流动人口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者,市辖区内人户分离者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区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跨省流动者指户口在外省的人口,省内流动人口则指户口在省内的外乡镇街道的人口。实线是根据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以及2005年和2015年1%小普查抽样数据计算,是因工作或者务工经商(不包括学习培训、随同迁移等)流动者,含跨省和省内跨市两类。

那么,劳动力跨省流动比例下降会是一种长期趋势吗?在省间人均收入差距仍然很大的背景下,畅通劳动力流动的堵点,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区域间人均收入的收敛(陆铭等,2019)。如果跨省劳动力流动相对减少,对“十四五”规划所提倡的“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有何影响?另外,中国经济已进入服务业占比超过制造业占比的发展阶段,2025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7.7%^②。服务业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地域文化差异也可能阻碍劳动力的跨省流动,且不利于充分就业和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在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

本文使用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2015年1%的人口抽样调查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省界会显著降低城市间的人口迁移规模。跨时期比较显示,无论是以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还是城市间流动人口数占当年流动人口总数之比作为因变量,省界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作用均在增强。那么,这真的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反而退步了吗?尤其是有一种观点认为跨省劳动力转移的下降是因为沿海产业转移到内陆,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出现省界的断点,也很难解释断点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本文的模型已经控制了距离的情况下。跨省劳动力流动趋势减弱,可能是因为省内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农民工调查数据,该调查始于2008年。网址:<http://www.stats.gov.cn>。

②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一体化领先于省间一体化。于是，本文分析 2008 年部分省份推行的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影响。首先，流动人口流出地省份如果实现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该省流动人口跨省迁移概率显著下降了 65.3%，且这种效应只在非农流动人口样本中显著。其次，流入地城市落户门槛越高，省界对人口迁移的阻碍作用越大。最后，流入地第三产业的发展会减弱省界壁垒的影响，但也会强化方言差异对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随着中国服务业比重的持续提高，省间语言差异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那么，畅通跨省劳动力流动有何意义呢？本文研究显示，省界、方言差异和地理距离均显著扩大了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收入差距。跨期比较发现，当期城市间劳动力流动比例（相对于两地常住人口之和）越高，越会显著缩小两地当期与前一期的收入差距之比。这说明提高劳动力流动率可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省界确实通过阻碍劳动力流动扩大两地收入差距。因此，只有凝聚共识，进一步畅通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堵点，才能有利于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而不能简单地把跨省劳动力流动相对减弱的现象误当作趋势。

本文有三方面的贡献。首先，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检验省界、方言和距离在时间维度上如何影响劳动力在城市间的流动，展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时间变化及区域差异。尤其是，本文利用部分地区推行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作为政策冲击，证明了省界对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部分是因为省内市场一体化快于省间。其次，本文证实随着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的增加，省间文化差异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作用在增强。最后，本文首次发现，劳动力要素跨省流动的省界、方言和地理距离障碍对省际收入差距具有负面影响，劳动力跨省流动的持续增加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介绍数据与模型，第四部分检验省界、方言、距离及自然地理对城市间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作用，第五部分从制度和产业结构角度检验省界阻碍人口流动的机制，第六部分检验跨地区劳动力流动障碍对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收入差距的影响，第七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统一劳动力市场有多重意义。首先，畅通劳动力流动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最大化收入和就业机会，在宏观上有利于提升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和教育回报率，这在人口数量红利消失的当下尤其重要（夏怡然等，2020）。其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导致人口和总产出（GDP）向少数地区集聚，同时可实现地区间人均 GDP 的趋同（陆铭等，2019）。再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拥有了更为丰富和 multidimensional 的需求，人口通过流动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地，通过“用脚投票”形成地区间竞争的蒂布特机制，激励地方政府优化本地的公共服务和提升生活质量（Tiebout, 1956）。最后，劳动力自由流动是货币一体化的区域或国家应对负面冲击的一种必要手段。在统一货币区内，各地区因条件不同受到不利冲击的影响不同。受负向影响的地区不能通过本币贬值来应对冲击，需要通过劳动力流出来避免负向冲击的影响（Mundell, 1961；钟辉勇等，2022）。

那么，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趋势如何呢？已有研究发现，省界阻碍了劳动力的跨省流动（赵永亮和赵德余，2012）。除省界边界效应会阻碍劳动力流动之外，自然的迁徙成本也会阻碍劳动力流动。劳动力迁移容易发生在接壤的两个区域或者省份，西部省份的迁徙壁垒远高于东部省份（赵永亮和李昕，2009）。但是，省界的作用既可能是因为行政因素，也可能是因为自然地理和文化因素，需要进一步区分各种因素的作用（Zheng 等，2022）。已有研究未能从省际边界效应中区分文化和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本文试图研究省界、方言、距离和自然地理如何增加劳动力流动成本，因而降低了城市间的流动人口数量。省界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随着时间如何变化也没有在文献中充分讨论，本

文将对劳动力流动障碍的变化进行跨时期比较和分析。

省界分割是相对于同省来说的，在时间趋势上，如果省界作用加强，也可能是省内一体化程度提高的表征。2018年7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推进各地区各部门政务服务平台规范化、标准化、集约化建设和互联互通，形成全国政务服务‘一张网’”。该意见总体目标是自2018年到2022年，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涉密等外，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平台办理，全面实现“一网通办”。截至2026年4月，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有187项事务实现了“跨省通办”，该平台连接了地方政府服务窗口，显示省内通办事项数量更多，类型更多样^①。上述文件加速了全国省内一体化进程，有利于促进个体的省内流动。相比而言，跨省一体化进程则相对滞后，省界构成了人口流动的阻碍因素。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是省内一体化的早期努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指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是省级。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层次从制度建立到全国统筹多个阶段。1986—1997年是县市统筹层次与养老保险制度架构的“双形成”阶段，1998—2006年实施省级统筹与养老保险制度结构微调优化阶段，2007—2016年再次实施省级统筹与覆盖面快速扩大阶段，尤其是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财政部印发《关于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有关问题的通知》，将10年前的“三统一”扩充为“六统一”（郑秉文，2022）。2009年所有省份宣布建立起省级统筹制度，但2012年审计署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有17个省未完全达到省级统筹的“六统一”标准^②。之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2017年9月发文，要求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③。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可能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省内流动，但相对来说不利于个体跨省流动。如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省内跨市流动（朱艺唯和申曙光，2025）。

另外，由于历史遗留原因，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也会阻碍劳动力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间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蔡昉等，2001a，2001b；陆铭，2011）。直到今天，户籍仍然与公共服务享受权利挂钩，这也是跨省流动与省内流动要面临的共同制度约束。比如，城市落户门槛是导致劳动力回流和儿童留守的重要因素（张吉鹏等，2020；魏东霞和谌新民，2018）。相比之下，跨省流动面临的户籍制度障碍更强，流入地城市落户门槛可能会强化省界对人口流动的阻碍效应。

从长远来看，制度上影响统一大市场的问题终将得到解决，但是非正式的制度因素对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在一个幅员辽阔、自然地貌丰富、民族众多、文化方言多样的国家，人口跨省流动会面临更大的方言和文化障碍。方言除了影响人们的信息沟通之外，也是一种外来人口身份的识别机制，特别是在服务业就业中，不会说本地方言不利于提高收入（Chen等，2014）。李仲达等（2021）利用基因、姓氏和方言三个维度计算了文化距离，结果显示文化差异对跨省流动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文化距离主要是通过信息沟通和身份认同两个渠道产生影响。中国已经进入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服务业更加需要人际沟通和交流。因此，在第三产业占比高的城市，个体流入和流出地的方言差异对跨省劳动力流动阻碍的作用可能更大。

对于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一种认识误区是，人口流动（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不利

①数据来源：国家政务服务平台，<https://gjzfwf.www.gov.cn/col/col1137/index.html>。

②参见《2012年第34号公告：全国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网站：<https://www.audit.gov.cn/n5/n25/c63607/content.html>，2012年8月2日。

③详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72号）。

于人口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并会扩大城乡或区域间收入差距。实际上，理论和国际经验均显示，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既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地区间人均 GDP 和人均收入的收敛（陆铭等，2019）。Heise 和 Porzio（2022）研究发现，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空间摩擦在企业之间造成了巨大的劳动力错配，空间摩擦通过保护企业免受其他地区工人竞争的影响，允许低生产率公司扩张，从而降低企业总体生产率。相比之下，在既有文献中，对于省界分割阻碍劳动力要素流动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鲜有直接的实证研究，本文讨论劳动力流动障碍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

三、数据与模型

本文使用 2000 年、2010 年人口普查和 2005 年、2015 年 1% 的人口抽样调查的样本数据，选取样本的定义如下：第一，仅涵盖因“工作就业”原因离开户籍地的个体，且被访者年龄大于 15 周岁；第二，所有年份均包含农业和非农业户口者，2015 年小普查问卷询问被访者“是否有土地承包权”，按照个体是否具有土地承包权定义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第三，样本只计算因工作原因而流动的个体，流动范围分为省内跨市和跨省流动两类，不单独讨论市内跨县（区）。另外，为检验数据的有效性，本文依据样本测算城市现居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并与各年城市实际常住人口占比拟合，系数范围约为 0.9~1，这说明本文所用的普查和小普查抽样数据与实际城市人口分布较为一致，数据满足研究需要^①。

本文参考李自若等（2022）的做法，在城市对之间建立 O-D 矩阵，使用引力模型研究省界、方言和距离对城市对间人口流动的影响。经过整理，得到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进入模型计算的城市间流动人口总量分别为 24524、117135、469810 和 112302。具体模型如下：

$$Migrant_{ij} = \beta_0 + \beta_1 Province_{ij} + \beta_2 Dialect_{ij} + Distance_{ij} + \mathbf{Z}\beta + u_{ij} \quad (1)$$

其中， $Migrant_{ij}$ 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从城市 i 流入城市 j 的流动人口数量对数。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有人口流动的城市对样本数量分别是 4207、10104、23539 和 12429 个。2000 年起点城市是 256 个，终点城市 248 个，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起点和终点城市数分别都为 278 个、284 个和 285 个。 $Province_{ij}$ 是核心解释变量，如果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跨省，则赋值为 1，同省则为 0。 $Dialect_{ij}$ 表示方言差异变量，如果流动人口流入和流出地城市方言不同，赋值为 1，相同则为 0。参考刘毓芸等（2015）的做法，本文使用方言区（片）度量方言差异，样本中共有 21 个方言区、88 个方言片。跨省流动的人口中，来自不同方言区的样本占比约 80%。 $Distance_{ij}$ 表示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距离。 \mathbf{Z} 是控制变量向量， u_{ij} 是随机扰动项。

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流入地和流出地城市 GDP 和常住人口。2015 年 GDP 数据来源于 2016 年《城市经济统计年鉴》，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 GDP 数据分别来源于 2001 年、2006 年和 2011 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各年份对应的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各地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 年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②。表 1 显示各年份终点城市平均的 GDP 和人口均高于起点城市。本文使用山川或河流度量自然地理条件，如果邻省的城

^①首先，按照样本计算各城市现居住人口总和，再测算各城市人口占比；然后，计算对应年份实际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后，将各个城市按照样本和实际计算的人口占比进行拟合，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拟合系数分别为 0.93、1.02、1.08、0.89，基本在 1 左右，由此说明各年份抽样考虑了城市人口规模，满足研究需要。

^②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城市常住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为：（1）各地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年平均人口由前后两年年末人口平均得到；（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由 GDP 除以人均 GDP 得到。两种数据来源相互匹配印证，同时参考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各省市官方渠道发布的常住人口数据，形成本文的常住人口数据，由李杰伟等整理完成。匹配时去掉由目前襄阳市（襄樊市）代管的宜城市、莱芜市（已是济南莱芜区）和思茅市（已更名为普洱市）。

市间有山川或者河流，赋值为 1，否则为 0。另外，模型中还控制了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中学和小学的生均教师数，每万人拥有的医院数、床位数和医生数。

表 1 主要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表

	2015 年 (N=12429)				2010 年 (N=23539)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对间流动人口数量	9.035	30.085	1	932	19.959	81.941	1	2826
跨省流动 (是=1)	0.794	0.405	0	1	0.884	0.321	0	1
方言区差异 (不同=1)	0.791	0.407	0	1	0.839	0.367	0	1
城市间距离 (公里)	820.039	600.688	7.942	3741.277	924.684	600.023	7.942	3782.305
流出地城市 GDP (亿元)	3452.180	4519.811	190.044	25123.450	1606.442	1999.711	105.800	17165.980
流入地城市 GDP (亿元)	5236.560	5935.584	190.044	25123.450	2684.782	3041.862	105.800	17165.980
流出地城市人口 (万人)	571.847	440.103	24.260	3004.010	508.089	366.709	22.090	2872
流入地城市人口 (万人)	656.434	529.269	24.260	3004.010	571.267	426.744	22.099	2872
	2005 (N=10104)				2000 (N=4207)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对间流动人口数量	11.593	38.741	1	1208	5.829	11.684	1	158
跨省流动 (是=1)	0.838	0.368	0	1	0.801	0.399	0	1
方言区差异 (不同=1)	0.810	0.392	0	1	0.792	0.406	0	1
城市间距离 (公里)	858.286	594.392	7.942	3741.277	778.922	571.038	19.969	3497.200
流出地城市 GDP (亿元)	725.250	931.622	44.878	9154.180	400.568	457.708	29.540	4551.150
流入地城市 GDP (亿元)	1673.819	1967.537	44.878	9154.180	917.397	903.515	17.931	4551.150
流出地城市人口 (万人)	511.836	364.917	18.200	2795.930	541.045	419.799	42.755	3051.276
流入地城市人口 (万人)	564.257	408.456	18.200	2795.930	598.676	410.087	15.954	3051.276

注：因篇幅所限，流入和流出地生均中小学教师数，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和医生数，山川河流数等未报告；GDP、城市间距离、人口数量在回归时均取对数。

四、省界、方言、距离、地理对城市间人口迁移的阻碍作用

(一) 基准回归

表 2 实证结果显示，省界显著降低了城市间的流动人口数量，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省界对城市间流动人口数量降低的程度分别为 10.1%、19.8%、62.1% 和 72.3%。如果在样本中增加没有人口流动的城市对，省界依然会显著降低城市间的人口流动数量（详见电子附表 1）。为了增加可比性，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换成样本中城市间流动人口数占当年流动人口总数的比例（详见电子附表 2），结果发现，省界还是会降低城市间劳动力迁移数量的占比，且自 2005 年开始，省界对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有增强的趋势，与基准回归结果中省界对人口流动阻碍效应增强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下文被解释变量使用城市对间流动人口数量，而不用流动人口数量占比，因为绝对数量结果更加直观，且容易解释。样本仅包含有人口流动的城市对。

我们简要总结一下其他因素对城市间人口流动的影响。如表 2 所示，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如果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城市处于不同的方言区，方言差异会显著降低城市间的人口流动数

量。已有研究发现劳动力倾向于流动到普通话沟通障碍小、拥有共同方言的地方工作（李秦和孟岭生，2014）。这与本文的发现是一致的。后文将继续检验产业结构与方言差异阻碍人口流动的机制。另外，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间距离越远，越会显著降低城市间流动人口的数量，且距离对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有下降的趋势，因为交通工具和基础设施已大幅改进。

表 2 省界、方言区及距离对城市间劳动力迁移数量的影响（全样本）

	(1) 2015 年	(2) 2010 年	(3) 2005 年	(4) 2000 年
跨省流动（是=1）	-0.723***(0.033)	-0.621***(0.032)	-0.198***(0.041)	-0.101*(0.052)
方言区差异（不同=1）	-0.069**(0.030)	-0.129***(0.026)	-0.096***(0.035)	-0.016(0.047)
城市间距离	-0.332***(0.015)	-0.451***(0.014)	-0.362***(0.019)	-0.233***(0.024)
流出地城市 GDP	-0.287***(0.019)	-0.533***(0.017)	-0.343***(0.025)	-0.215***(0.031)
流入地城市 GDP	0.586***(0.020)	0.974***(0.017)	0.908***(0.021)	0.486***(0.030)
流出地城市人口	0.604***(0.027)	0.932***(0.024)	0.656***(0.035)	0.446***(0.046)
流入地城市人口	-0.174***(0.024)	-0.460***(0.020)	-0.543***(0.028)	-0.175***(0.0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429	23539	10104	4207
R^2	0.338	0.362	0.317	0.201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控制变量包括流入地和流出地中学和小学的生均教师数，流入地和流出地每万人拥有的医院数、床位数和医生数。

表 2 结果还显示，流动人口流入地 GDP 与城市间人口流动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流出地 GDP 则与城市间人口迁移呈负相关关系。人口的影响相反，流出地人口越多，越会增加劳动力外出流动；流入地人口越多，越会减少城市间的人口流动数量。实际上，本文模型控制了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 GDP 和人口，本质上相当于控制了城市间人均 GDP 的差距。这意味着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人均 GDP 差距越大，越会吸引人口在城市间流动。

（二）邻省和非邻省对城市间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为进一步讨论省界对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本文区分跨省中邻省和非邻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表 3 结果显示，跨省中，邻省比非邻省对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更小，但 2000—2015 年，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且逐渐趋同。邻省城市间自然地理、语言文化都比较接近，其对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更可能来自省界的行政因素。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省界已经是阻碍人口流动的重要力量。

表 3 跨省中邻省和非邻省对城市间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1) 2015 年	(2) 2010 年	(3) 2005 年	(4) 2000 年
跨省中的非邻省，同省=0	-0.757***(0.043)	-0.782***(0.039)	-0.415***(0.053)	-0.344***(0.068)
跨省中的邻省，同省=0	-0.722***(0.033)	-0.621***(0.032)	-0.200***(0.041)	-0.110**(0.0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429	23539	10104	4207
R^2	0.338	0.363	0.319	0.206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控制变量包括流入地和流出地中学和小学的生均教师数，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和医生数，城市间距离对数，城市间方言区差异。

(三) 自然地理条件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省界是由多重因素共同构成的, Zheng 等 (2022) 针对物流中与省界有关的多种因素做了细致的拆分, 而针对劳动力市场则还没有同样的分析。表 4 单独考察相邻省份样本中方言、距离及自然地理条件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可以发现, 首先, 城市间有山川或河流会显著降低人口流动数量; 其次, 流入地和流出地城市间的距离越远, 越会阻碍城市间的人口流动; 最后, 邻省样本中, 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方言差异也会阻碍人口的跨市迁移。

表 4 方言区、距离及自然地理条件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邻省样本)

	(1) 2015 年	(2) 2010 年	(3) 2005 年	(4) 2000 年
城市间有山川或河流 (有 =1)	-0.157*** (0.040)	-0.175*** (0.036)	-0.126*** (0.048)	-0.239*** (0.073)
城市间距离	-0.160*** (0.034)	-0.329*** (0.032)	-0.160*** (0.043)	-0.075 (0.057)
方言区差异 (不同 =1)	-0.140*** (0.041)	-0.282*** (0.040)	-0.256*** (0.052)	-0.007 (0.07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199	6229	2734	1188
R^2	0.331	0.375	0.370	0.258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 和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控制变量包括流入地和流出地中学和小学的生均教师数, 流入地和流出地每万人医院、床位和医生数。

(四) 省界、方言和距离对内陆和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中国劳动力主要从中西部内陆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①, 下文将检验省界、方言和距离对人口流动影响的区域差异。检验结果表明 (详见电子附表 3), 省界和距离均会显著降低内陆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的迁移数量, 这种效应在内陆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内部城市对间劳动力的流动中依然存在; 省界对区域间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有增强的趋势, 距离的影响却在减弱, 这可能是因为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另外, 方言对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存在区域差异, 内陆地区向外迁移或者内部流动的劳动力受方言的阻碍作用更大。中西部内陆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方言片分别有 57 个和 39 个, 方言种类的多样阻碍了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动。中国已经进入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的阶段, 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更需要人际交流 (魏东霞和陆铭, 2021; 乐君杰和胡博文, 2017; Chen 等, 2014)。只要语言在地区间存在差异, 那么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时面临的语言文化差异就可能更明显地显现出来。

五、机制分析: 制度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一)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影响

上文分析了在推进全国行政一体化过程中, 同省一体化率先加速推进, 可能导致省内劳动力流动的壁垒短期内大大降低, 而跨省流动障碍则会增加。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为检验省界行政壁垒提供了一个政策冲击。本文基于 2015 年小普查样本数据, 实证检验流出地省份是否存在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对个体跨省迁移的影响, 其中, 有和没有农村土地承包权者分别定义为农业和非农业人口。被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是否跨省流动, 跨省流动为 1, 否则为 0。流动人口指因工作就业离开户口登记地者; 解释变量是个体流出地省份是否实现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是则定义为 1, 否则为 0。根据《人力资

^①文中的中西部内陆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包含了东北三省; 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源社会保障部公布 2008 年全国社会保险情况》，截至 2008 年底，全国共有北京、天津、吉林、黑龙江、上海、福建、重庆、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江西、湖南、河南和西藏 17 个省份实现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①。为保证本文口径一致，样本中不含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

表 5 结果显示，人口流出地省份如果实现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则会显著降低个体跨省流动的概率，而且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只会显著降低非农业人口跨省流动的概率。省级统筹实际上统筹的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理论上与非农业人口关系更密切，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下文将进一步检验这项政策对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者的影响。

表 5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对个体跨省迁移的影响

	全样本	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	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者		
				全部	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
流出地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是 =1)	-0.653*** (0.134)	-0.153 (0.348)	-0.629*** (0.131)	-0.626*** (0.135)	0.132 (0.103)	-0.611*** (0.136)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流入地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流出地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15401	72594	42807	32820	15662	17158
R^2	0.645	0.685	0.619	0.695	0.783	0.666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样本数据中，2010 年和 2000 年没有个体参加养老保险调查，2005 年只调查个体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无具体分类，参保比例很低；各年度口径不一致，本文只用 2015 年数据进行检验；个体特征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户口性质、性别、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是否有工作。

2015 年小普查问卷询问了 15 周岁及以上个体参加养老保险情况，选项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未参加以上四种社会养老保险。汇总统计显示，个体参加任何一种保险和未参加任何养老保险的比例分别为 68.25%和 31.75%；个体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 28.44%，非农业和农业户口者参保占比分别为 40.08%和 21.57%；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比例分别为 30.02%、9.17%和 0.63%。表 5 结果说明，对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者，流出地省份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依然会降低个体跨省迁移概率，这种效应只对非农业人口显著。尽管这项政策对农业人口影响不显著，但对其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会改变他们未来市民化道路的预期，也会对其流动决策产生影响。特别是随着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这种效应会更加明显。

以上结果说明，省内养老保险一体化显著降低了个体跨省流动的比例，这意味着同省一体化会降低劳动力省内流动的阻碍，相对而言提高了个体跨省流动的壁垒。但不能简单认为跨省劳动力流动相对减少是趋势性的，省内一体化是推进全国一体化的前期准备或必要条件，长期来看，伴随着全国一体化的推进，省界的影响可能会下降，跨省劳动力流动趋弱的现象有可能是短期结果。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主要影响非农业户口者。2005 年和 2010 年农村人口跨省流动者占比分别为 79.9%和 76.1%，城市人口跨省流动者占比分别为 74.4%和 69.3%，2005—2010 年，城市人口跨省流动比例下降更快^②。需要强调的是，全国一体化推进需要多方协调，尤其是涉及医疗或者养老保险之

①数据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06-12/1731195.shtml>。

②2000—2015 年农村人口跨省流动者占比分别为 76.9%、79.9%、76.1%和 48.4%；城市人口跨省流动者占比分别为 69.8%、74.4%、69.3%和 59.5%。城市人口跨省流动比例相对稳定，2010 年下降较大；农村人口跨省流动比例 2010 年之前一直较高，2015 年突然下降很可能是因为大城市 2014 年提高落户门槛。

类的重要事项，由于各省标准不同，实现全国一体化可能还需较长的时间。即便如此，养老保险全国一体化也是必然趋势，且许多省份的医疗保险已经实现了异地报销，城市公共服务也越来越对外来人口开放，这些都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人口的跨省流动。因此，对于农村户籍人口是否存在跨省流动趋弱的现象需要谨慎作出判断。

(二) 落户门槛的作用

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在推进，中小城市落户门槛基本放开，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依然存在落户限制。201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以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牵引区域流动。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至 500 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常住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实际上，中国人口持续向大城市和中心城市集中，中心城市的地位日益凸显。“七普”数据显示，2020 年 26.4% 的人口居住在直辖市、省会、副省级城市，21.6%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群中心城市，13.3% 的人口居住在九个国家级中心城市 (Li 等, 2023)。人口的流向与城市落户门槛放开的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跨省迁移者要面临城市落户门槛和省界壁垒的双重影响。

表 6 通过在模型中控制城市落户门槛和省界壁垒的交互项，检验二者对人口流动的双重影响。本文使用张吉鹏和卢冲 (2019) 测算的城市落户门槛综合指数作为衡量城市的户籍门槛指标^①。其中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与 2000—2013 年落户门槛指数匹配，2015 年与 2014—2016 年的落户门槛指数匹配。表 6 结果显示，除 2010 年之外，城市落户门槛指数与跨省流动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如果是跨省流动，那么流入地城市落户门槛越高，越会显著降低城市间的劳动力迁移数量，城市的高落户门槛强化了省界壁垒对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值得注意的是，2000 年和 2005 年交互项系数为负，但系数绝对值下降，到 2010 年系数转为正，说明高落户门槛的地方逐渐从不利于人口迁入转向有利于人口迁入。这可能是因为在当时，通常落户门槛高的地方也有更大的劳动力需求。这从落户门槛指数本身的系数为正可以得到说明，流动人口的流动决策更多出于就业考虑，而不是落户考虑，对于农村户籍人口更是如此。但是到 2015 年，落户门槛指数与跨省流动的交互项系数又变成负数，而且 2015 年交互项的系数绝对值最大，我们猜测这是因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 2014 年之后实施了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因此城市高落户门槛进一步强化了省界对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

表 6 城市落户门槛指数与跨省流动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全样本)

	(1) 2015 年	(2) 2010 年	(3) 2005 年	(4) 2000 年
落户门槛指数 × 跨省流动	-1.077*** (0.142)	0.323** (0.138)	-0.269* (0.147)	-0.491*** (0.155)
城市落户门槛指数	1.814*** (0.148)	0.447*** (0.138)	1.170*** (0.146)	1.006*** (0.154)
跨省流动	-0.207** (0.101)	-0.914*** (0.102)	-0.005 (0.119)	0.318** (0.1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402	13252	6648	3062
R^2	0.439	0.438	0.409	0.258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和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控制变量包括流入地和流出地人口和 GDP、中学和小学的生均教师数，每万人医院床位数和医生数，城市间距离的对数、城市对方言区差异。

①感谢张吉鹏老师提供的 120 个城市落户门槛指数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跨省流动占比下降与流动人口规模呈现上升趋势是同时存在的两个现象。户籍制度的改革是解释人口流动规模不断上升的因素，但同时，户籍制度改革推进较快的地方与人口流动方向的不一致是解释流动人口跨省迁移占比下降的重要因素，两者需要进行区分。

(三) 产业结构与方言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文化方言多样的国家，那么如果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方言存在差异，随着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方言是否将对人口流动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本文将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流入地城市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与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之比作为衡量产业结构特征的指标，检验流入地产业结构特征对人口流动的影响^①。表 7 显示，2000—2015 年，省界与产业结构特征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流入地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越高，越会消解省界对人口流动的阻碍效应。第三产业有更强的就业吸纳能力，更容易吸引人口流入，因此更能克服省界对人口流动的壁垒作用。此外，产业结构特征与方言片差异的交互项的系数在 2005 年和 2015 年均显著为负^②，即流入地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越高，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方言差异越会显著降低城市间人口流动数量。与本文发现相呼应的是，Chen 等(2014) 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对方言掌握程度越高，越会提高个人在服务业中的就业概率及收入水平。而流动人口进城时间越早，越会通过提升个体的沟通和交流等非认知能力，增加其进入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概率，进而提升个体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魏东霞和陆铭，2021）。表 7 结果说明，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越高，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方言差异对城市间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越大。中国已经进入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重要的阶段，方言差异等非制度因素对人口流动的阻碍作用可以部分地解释跨省劳动力流动趋弱的现象。

表 7 产业结构特征与方言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2015 年		2010 年		2005 年		2000 年	
	(1)	(2)	(3)	(4)	(5)	(6)	(7)	(8)
三产就业人数 / 二产就业人数 × 跨省流动	0.127*** (0.030)	0.154*** (0.034)	0.152*** (0.024)	0.151*** (0.026)	0.226*** (0.039)	0.270*** (0.042)	0.107** (0.053)	0.129** (0.068)
三产就业人数 / 二产就业人数 × 方言片差异		-0.107** (0.049)		0.001 (0.034)		-0.150*** (0.057)		-0.040 (0.079)
跨省流动	-0.874*** (0.051)	-0.905*** (0.054)	-0.846*** (0.048)	-0.845*** (0.051)	-0.514*** (0.069)	-0.571*** (0.072)	-0.231*** (0.081)	-0.256*** (0.096)
方言片差异 (不同=1)	-0.165*** (0.043)	-0.036 (0.077)	-0.151*** (0.041)	-0.152** (0.067)	-0.009 (0.048)	0.190** (0.094)	-0.032 (0.060)	-0.014 (0.1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429	12429	23492	23492	10104	10104	4204	4204
R^2	0.342	0.343	0.367	0.367	0.330	0.330	0.202	0.202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和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控制变量含流入地和流出地人口和 GDP，中学和小学生均教师数，每万人医院、床位和医生数，流入地三产与二产就业人数之比，城市间距离。

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 年、2006 年、2011 年和 2016 年就业人口数据，其中 2000 年数据根据 2001 年《表 3-3 就业结构》计算，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值等同于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结构比值。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据 2006 年和 2011 年《表 2-3 按三次产业分的单位从业人员就业状况》、2016 年《表 2-3 按产业划分的年末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数计算，就业人数口径均为年末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

②本表主要是用方言片差异与产业结构特征的交互项，使用方言区差异与产业结构特征的交互项，结果大致类似，但是显著性方面弱于方言片，这可能是由于方言片对方言分类更细，识别度较高，尤其是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更加明显。

六、经济后果分析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要素流动使得要素回报均等化。若省界、文化、距离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摩擦和成本，降低了城市间劳动力流动数量，最终可能导致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本文使用两个指标衡量收入差距：第一，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第二，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人均 GDP 之比。基准回归模型中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和 GDP 与上述两个指标高度共线，表 8 和表 9 不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表 8 实证结果显示，从 2000 年到 2015 年，省界、方言差异和长距离总体上均会伴随着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和人均 GDP 差距的扩大（对人均 GDP 差距的影响详见电子附表 4），仅个别系数不显著或者异常。

表 8 省界对流动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1) 2015 年	(2) 2010 年	(3) 2005 年	(4) 2000 年
跨省流动	0.043***(0.009)	0.019 (0.015)	0.032**(0.014)	0.109***(0.028)
方言区差异 (不同 =1)	0.069***(0.008)	-0.028(0.018)	0.137***(0.012)	0.110***(0.027)
城市间距离	0.028***(0.005)	0.098***(0.007)	0.135***(0.008)	0.188***(0.01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489	23217	9848	3909
R^2	0.393	0.098	0.216	0.28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和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控制变量含流入地和流出地中小学教师数，每万人医院数、床位数和医生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 GDP 数据有缺失，各年观测略有不同。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自 2001 年、2006 年和 2011 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5 年数据来自各省 2016 年统计年鉴。2000 年人均 GDP 数据来自 2001 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其他年份人均 GDP 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陕西省各市 2000 年人均 GDP 来自《陕西统计年鉴 2015》。

流动人口规模增加是否会缩小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收入差距呢？本文将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流动人口数量之和与流入地和流出地城市居住人口之和的比值作为解释变量，反映城市对之间的人口流动率，该数值越大，表示城市间的流动人口规模越大。因其数值偏小，文中将该数乘以 100。其回归系数表示人口流动率增长一个百分点时，对两地收入差距的影响。城市居住人口根据四期普查和小普查调查时点的人口计算，分别与流入地城市和流出地城市匹配，获得流入地和流出地城市调查时点居住人口数量。被解释变量为两期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收入差距之比，分别使用流入地和流出地两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之比和流入地与流出地人均 GDP 差距之比衡量。这里收入差距与表 8 定义的相同，即为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和人均 GDP 之比。

表 9 列 (5)、列 (3) 和列 (1) 结果显示，流动人口规模对流入地和流出地三个跨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之比的影响系数依次为正、不显著和显著为负，说明早期城市间流动人口占比越高，会扩大两地两期收入差距。这可能是由于早期人口流入地由于集聚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提升了劳动力的收入，而人口流出地依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收入增长相对较慢。另外，早期人口流入地拥挤效应不大，未产生足够的扩散效应。之后，随着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系数逐渐不显著，到 2015 年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城市间流动人口规模越大，人口流动率越高，越会降低两地两期的收入差距之比，也即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这说明，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是先扩大再缩小的，与其他国家的经验一致^①。值得注意的是，控制了劳动力流动之后，省界的作用在缩小，这间接

^①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收入差距先扩大再缩小的历程，参见《2009 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说明跨省是以劳动力流动为中间机制。流动人口规模对两地两期人均 GDP 差距之比的影响类似（详见电子附表5）。

表 9 省界对流动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两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之比的影响

	2015 年相对 2010 年		2010 年相对 2005 年		2005 年相对 2000 年	
	(1)	(2)	(3)	(4)	(5)	(6)
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流动人口总数 / 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常住人口总数 × 跨省流动		-0.199*** (0.039)		-0.048*** (0.011)		-0.025 (0.021)
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流动人口总数 / 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常住人口总数	-0.037*** (0.014)	-0.013 (0.015)	0.002 (0.005)	0.028*** (0.009)	0.037*** (0.011)	0.056*** (0.018)
跨省流动	-0.021* (0.012)	-0.010 (0.012)	-0.007** (0.003)	-0.003 (0.003)	-0.031*** (0.005)	-0.029*** (0.005)
流入地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375	12375	22534	22534	8946	8946
R^2	0.107	0.107	0.941	0.941	0.611	0.611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和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控制变量包括流入和流出地中学和小学生均教师数，流入地和流出地每万人医院床位数和医生数、城市对方言区差异、城市间距离。

表 9 列 (2)、列 (4) 和列 (6) 结果显示，两个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占比与跨省流动的交互项系数依次为显著为负、显著为负、不显著，且靠近最近年份的列 (2) 系数约为列 (4) 的四倍。这说明跨省劳动力流动越多，越有助于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收入差距的收敛，从而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这说明，现阶段省内劳动力流动相对增多，并不意味着跨省劳动力流动真的放缓了，如果疏通跨省劳动力流动的堵点，未来跨省劳动力流动的增多，才可能进一步缩小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2000—2015 年人口普查等数据发现，省界会显著降低城市间的劳动力流动数量，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因素。跨时期比较显示，无论是以劳动力流动规模还是城市劳动力流动数量占比作为因变量，省界壁垒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作用均在增强。其次，相对于同省流动而言，非邻省比邻省对劳动力迁移的阻碍作用更大，但是二者逐渐趋同，进一步体现了省界壁垒的阻碍作用。另外，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条件、方言和距离均会显著降低城市间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机制检验发现，如果流动人口流出地省份实现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则会显著降低该省个体跨省迁移的概率，且对非农业流动人口的阻碍作用更加明显。这意味着跨省劳动力流动的相对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跨省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滞后于省内的一体化进程。另外，流动人口流入地城市的落户门槛越高，越会强化省界对人口流入的阻碍作用。流入地第三产业就业占比高，会因为劳动力需求的作用，减弱省界壁垒对人口流动的阻碍效应；但方言差异会减弱产业结构特征对城市间人口流动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服务业需要沟通交流，语言的重要性更突出。随着中国服务业比重持续提高，非正式制度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可部分地解释跨省劳动力流动相对减少的现象。上述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总体上会扩大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疏通劳动力市场的堵点尤其重要。而且不能简单地认为跨省劳动力流动趋弱的现象是长期的，否则可能会在思想和行动上不利于进一步推进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快构建一体化的

劳动力要素市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等限制,并结合医保跨省直接结算政策,有效降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第二,改革地方政府考核机制。由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要求地方政府弱化对GDP增长和税收增长的考核。如仍需保持GDP考核的话,也要在人口流出和人口流入的不同地区进行差别化的考核机制设置,既考虑GDP总量的增长,也考虑人均GDP的增长。越是人口流入多的地区越要加大GDP总量增长考核的权重,而在人口流出较多的地区则赋予人均GDP增长率更高权重。第三,在特大和超大城市推进都市圈规划建设。建议尊重区域和城市的发展规律,从中央层面推进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半径在50~80公里的都市圈(大约一小时通勤圈)发展规划。在都市圈范围之内重新科学预估人口增长形势,在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与人口增长挂钩的建设用地增长机制,以及一体化的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机制。在都市圈范围内规划各类用地的空间格局,打破按行政区划设定开发强度和开发边界的传统做法。鼓励城市群内城市间形成多类型的交流合作机制,在基础设施连通、公共服务互认的基础上,探索深层次的成本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

面向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破除体制障碍,促进劳动力、人才跨地区顺畅流动。只有通过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设,才能提高地区间的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全局和多维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地区间在发展中走向相对平衡。

参考文献:

- 蔡昉,王德文,都阳. 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a, (2): 4-14+204.
- 蔡昉,都阳,王美艳. 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 经济研究, 2001b, (12): 41-49+91.
- 乐君杰,胡博文. 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17, (4): 66-76+127.
- 李秦,孟岭生. 方言、普通话与中国劳动力区域流动[J]. 经济学报, 2014, (4): 68-84.
- 李仲达,林建浩,邓虹. 跨越省际移民中的文化壁垒: 信息沟通与身份认同[J]. 经济学(季刊), 2021, (5): 1691-1710.
- 李自若,杨汝岱,黄桂田. 中国省际贸易流量与贸易壁垒研究[J]. 经济研究, 2022, (7): 118-135.
- 刘毓芸,徐现祥,肖泽凯. 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倒U型模式[J]. 经济研究, 2015, (10): 134-146+162.
- 陆铭. 玻璃幕墙下的劳动力流动——制度约束、社会互动与滞后的城市化[J]. 南方经济, 2011, (6): 23-37.
- 陆铭. 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 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J]. 学术月刊, 2022, (3): 58-71+109.
- 陆铭,李鹏飞,钟辉勇. 发展与平衡的新时代——新中国70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J]. 管理世界, 2019, (10): 11-23+63+219.
- 王桂新.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变化特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22, (3): 2-16+126.
- 魏东霞,谌新民. 落户门槛、技能偏向与儿童留守——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18, (2): 549-578.
- 魏东霞,陆铭. 早进城的回报: 农村移民的城市经历和就业表现[J]. 经济研究, 2021, (12): 168-186.
- 吴楚豪,刘玉函,王恕立. 国内市场互联互通与省际贸易福利提升——基于国内市场“五统一”的视角[J/OL]. 当代财经, 2025-07-23[2026-04-10]. <https://doi.org/10.13676/j.cnki.cn36-1030/f.20250723.002>.
- 夏怡然,张翕,周小刚. 空间的力量: 在集聚中积累人力资本[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 张吉鹏,黄金,王军辉,等. 城市落户门槛与劳动力回流[J]. 经济研究, 2020, (7): 175-190.
- 张吉鹏,卢冲.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落户门槛的量化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19, (4): 1509-1530.
- 赵永亮,李昕. 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边界效应——基于个体迁徙微观抉择模型[J]. 南方人口, 2009, (3): 27-34.
- 赵永亮,赵德余. 市场获得与中国劳动力迁徙的边界效应[J]. 南方人口, 2012, (5): 32-44.
- 郑秉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实现路径与制度目标[J]. 中国人口科学, 2022, (2): 2-16+126.
- 钟辉勇,陆铭,李瑞峰. 增长、补贴与债务: 统一货币区的空间政治经济学[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2, (6): 75-88.
- 朱艺唯,申曙光.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 当代财经, 2025, (5): 30-43.

- Chen Z, Lu M, Xu L. Returns to dialect: Identity exposure through language in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4, 30: 27–43.
- Heise S, Porzio T. Labor misallocation across firms and regions[J]. NBER Working Paper, 2022, No.30298.
- Li J W, Zhao W Y, Liang Q Q. Agglomeration and radiation: Central cities and China's spatial economy[J]. *Asian Economic Papers*, 2023, 22(2): 36–67.
- Mundell R A.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4): 657–665.
- Poncet S. Measuring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 14(1): 1–21.
- Tiebout C M.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5): 416–424.
- Zheng Y L, Lu M, Li J W. Internal circulation in China: Analyzing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integration using big data for truck traffic flow[J/OL]. *Economic Modelling*, 2022, 115: 105975.

Removing the Labor Market Obstacles: Provincial Boundaries, Culture and Geography

Wei Dong-xia¹, Lu Ming²

(1.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510521, China;

2.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Removing the obstacles of migration is most significant for a unified market. Lacking the inter-temporal assessment of migration obstacles, people observed that the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obility is weakening. Based on the census data from year 2000 to 2015, the division of provincial boundarie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scale of migration between cities, and its effects tended to be enhanced. Dialects, natural geography, and distance also acted as barriers to population movement. The weakening of inter-provincial labor mobility is essentially the result of the inter-provincial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lagging behind within-provincial integration. For example, the unified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in the population-outflow province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probability of inter-provincial mobility, while the high threshold for getting hukou in inflow cities strengthened the segmentation effect of provincial boundaries.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 the inflow city weakened the effect of provincial boundary barriers, it strengthened the blocking effect of dialects on population mobility. The abov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provincial boundaries, dialect differences 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s between city pairs widened their income gaps. With the aim of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regions, we must build consensus and further smooth the flow of labor across provinces.

Keywords: unified labor market; provincial boundary; labor mobility; income gap

责任编辑：王俊杰